

论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危机的思想

秦汉锋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往往是与整个经济的危机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也主要表现为货币危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研究是与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看到,在马克思的商品与货币的理论中,在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刻剖析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思想。到现在,这些思想依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对于我们从本质上来认识金融风险 and 危机的生成机理,提出科学的防范对策,仍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提出了一个含义极为深刻的论断。他说:“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理解这段话,需要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说起。

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私有制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前提。社会分工使生产者需要通过市场在他们之间交换劳动产品。私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能与社会接触,所以,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被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个人劳动者的产品能否顺利地市场上进行交换,实现“惊险的一跳”,这是商品经济所遇到的第一难题。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产生货币,它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价值的一般代表,是为方便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交换的扩大和加强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质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不断发展。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的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商品交换的扩大促使了货币的产生,货币的产生又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货币使商品交换过程在买卖上分离开来,物物交换的那种买卖合一的情况被买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所代替。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离使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存在着交易失败的可能性,所以货币的产生本身又使商

品交换的风险得以增加。货币产生以后,它成为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独立存在的表现,存在于现实生产之外。由此,它就一方面产生了引起货币危机(用现在的话说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经济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货币即金融危机)。

从整个经济的危机来说,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就已经蕴藏着危机的可能性。危机可能性的第一种形式,存在于商品形态的变化之中,即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所产生的买和卖的分裂。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条件下,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分离,如果某些商品生产者只卖不买,就会造成另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商品滞销,使买卖脱节。危机可能性的第二种可能,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产生的支付连锁关系的破坏。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条件下,商品是以赊销的形式出卖的,虽然商品已经转手,但商品的价值并没有真正实现,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破坏信用链条。由此而来就会产生货币危机。货币执行世界货币职能,就使货币成为国际经济危机传导的载体。

但是,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发生危机的两种可能性只是潜在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而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随着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商品生产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形式,商品形态变化表现为资本的形态变化,商业和信用关系也获得了普遍的发展,所以产生买卖脱节和支付连锁关系破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发展了。但是,这些仍然是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可能性本身终究只是可能性,危机的抽象形式并不就是导致危机必然爆发的原因。马克思说:“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

料占有的资本主义私人性质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对抗性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也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层的矛盾是由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引起的,表现在危机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对抗和冲突是经常存在的,只是当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生产迅速扩大与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发生剧烈冲突,严重破坏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才会爆发危机,而“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商品被销毁,使资本主义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用强制的方法暂缓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恢复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比例关系,但危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危机过去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相适应,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也会继续发展,并重新激化起来,这就使得另一次新的危机成为不可避免。恩格斯指出:“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间间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危机间隔的时间在缩短,即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马克思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言。

二、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危机的若干重要思想

(一) 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虚拟化与货币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马克思还认为虚拟资本的运动与现实资本可以没有关系,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虚拟资本是和现实资本相对而言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职能的资本,是现实起作用的资本,它表现为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等形式。虚拟资本则不同,它往往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表现出来。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也不能作为价值符号,更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是在它的所有者看来,它能够带来收入,似乎就是资本,但从实质上来说,它并不是资本,只是未来预期收益的资本化。从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关系来看,虽然在有的情况下,虚拟资本数量和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反映出现实资本数量与价值的变化,但在通常情况下,虚拟资本数量与价格的变动幅度和频繁程度要远远大于现实资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金融领域出现了虚拟资本的数量急剧增长,虚拟资本表现形式增多、虚拟资本交易量扩大和经济虚拟化加强的情况,经济虚拟化常常引起过度投机、金融风险 and 大量资本在博弈中浪费等问题,泡沫经济的破灭往往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并可能形成连锁反应,对信用、流通和生产造成伤害。

(二) 货币用作支付手段与货币危机

从《政治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内容看,马克思对货币作支付手段与信用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很感兴趣的。对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一,支付手段发展的前提,是期买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得到广泛的采用,这种发展甚至使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作用超过作为流通手段的作用。货币作支付手段时作用的范围往往是大宗贸易,而起媒介作用的范围则是零售、小额贸易。在这类交易中,支付相抵的部分,不需要使用货币,货币限于用来结算时支付小的差额。这就是说,在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情况下,当支付平衡、支付作为正数和负数相互抵消时,货币可以表现为商品的单纯观念的形式。第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支付手段的职能也随之发展,而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作用却日趋下降,二者呈相反的发展趋势。第三,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本身包含着如下矛盾:一方面,交换价值具有不以它作为货币的存在方式为转移的形式;另一方面,它作为货币的存在方式恰恰表现为最终的和唯一的最适当的存在方式。第四,如果支付平衡过程由于信用的突然波动而被打断,支付机制遭到破坏,那时人们就会突然要求货币成为一种实际的支付手段,并要求财富的双重形式即货币和商品同时存在。第五,在危机时期,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上述矛盾充分表现出来,在危机中,需要的不是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也不是作为铸币的货币,需要的是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一般等价物、作为抽象财富化身的货币。总之,需要真正的货币,即货币本身。“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现金。”所以,“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这是因为当平衡机制和作为这一机制一定基础的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货币就会违反现代商业的协议,违反现代商业的一般前提,突然必须以它的实在的形式出现和使用,从而发生了冲突。总之,马克思揭示了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与信用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

(三) 信用货币与货币危机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金属货币和纸币,只是简单地涉及到信用货币的产生并用于对货币的商品性和信用性之间关系的说明中。到了第3卷,当马克思研究了资本周转的周期性、生息资本和作用后,才进一步分析信用货币产生的必然性——产业活动的周期冲动及其对贵金属本位限制的冲击,信用货币的运动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从而完成了从商品货币理论向信用货币理论的转化。他说:“开出汇票是把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的贴现只是把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⁴⁰马克思分析了汇票、银行券的流通及其与危机的关系,汇票和银行券的数量由交易的需要决定,只有货币短缺,汇票流通才受银行券流通规模的影响。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可以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现金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事实上,由于银行结算业务的发展,信用货币的绝对量要远远大于流通中的纸币量,从而造成信用货币的广泛使用和信用货币量的极度膨胀。这一方面节约了流通中的货币量,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隐藏着货币及信用危机的可能性。既然信用货币流通的基础是商品流通,那么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忘记。而“一旦信用发生动摇,一切现实的财富就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⁴¹,因为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⁴²因为信用货币经过结算抵消后的余额有时是需要以现实货币来支付的,“需要偿付的只是债务差额,支付越集中,差额相对地越小。一旦遇到经济衰退和商业危机,现金货币准备量不能满足支付需要,支付链条的某一环节就要发生断裂,并发生连锁性反映,严重动摇了信用基础,引起货币及信用的危机”⁴³。此时,本来作为进行结帐清算的观念上的计算货币,也要用现实的货币来支付,“货币就会突然从计算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到处都要求支付并偿还债务,由此造成货币短缺,货币愈是短缺,信用危机愈是严重,从而进一步引起货币的短缺。“货币在恐慌时期还是在那里;但每个人都不让它转化为借贷资本,即借贷货币;每个人都抓住它不放,以便应付实际的支付需要。”因此,既然信用货币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高涨而流通和发行的,在危机时必然出现挤兑风潮,“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⁴⁴。

(四) 信用制度、银行制度与货币危机

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的限制会被信用制度和与信用制度相联系的联合经营打破,而当信用制度打破了这个界限后,又使生产更加盲目发展,信用危机与生产过剩的危机也

就随之而来。信用制度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缩。“在信用紧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⁴⁵所以,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不仅加大了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而且可能使危机产生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⁴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分析了资本主义银行制度,指出银行把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到货币市场上去,从而打破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外一方面又创造了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种形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原来闲置的货币准备金是以存款的形式出现的,对它的所有者来说,由于存款可以随时支取,因而它仍然执行着流通准备金的职能。但是,这些存款并不是锁在银行保险柜里的,而是通过贷款又投放到流通中去了,因而这些准备金对社会来说实际上处在流通之中。银行会按日常支取的正常需要,将社会流通所需要的准备金减少到最低点。它迫使所有的货币资本服务于生产,大大节约了流通费用,但这种节约是与银行家的业务扩张和获取高额利润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是采取借贷资本的形式来经营货币的特殊机构,因此,同一个银行准备金,不仅要承担国内国际流通准备金的义务,而且同时成为银行存款和信用发行的准备金。正因为银行准备金集国内外货币流通和信贷流动准备金于一身,它就将经济的各个领域内的货币活动连结在一起了。由此使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向中央银行集中,加上尽可能最低限度地缩小这一准备金,致使金属准备在循环过程中不再能发挥它应当起的职能作用,这样中央银行的贵金属准备就起到了整个信用制度的枢纽的作用。虽然马克思也肯定银行制度的作用,“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就会加剧恐慌”⁴⁷,但也指出,资本主义银行制度的产生,实现了资本的相互融通,满足了经济发展对货币的不断扩大的需要,银行通过加快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促进经济发展,不过,银行的这些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加大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经济危机的程度。

马克思指出,贵金属输出输入不仅是作为量,而且还在于它作为货币资本的性质而发生影响:作为资本,有供求市场,有价格(即利率),它的变动要影响到借贷资本市场的供求,而借贷资本市场供求和利率的变动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是一般的交换手段,一般的支付手段和一般的财富转移手段,所以它的变动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支付能力。贵金属流出入所产生的影响是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分不开的。这就是

说, 银行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存款, 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准备金减少到最低的, 乃至不能保证顾客对存款的提取和兑现的需要的限度。一旦由于贵金属流出, 国内银行不能按时如数保证部分顾客提取, 就必然造成一种现象即引起人们挤兑和大量提取存款。马克思说: “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 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⁴⁸ 如果没有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 即使贵金属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 也不会产生这种过敏现象。因为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 这种制度实质上是把部分准备金用于生利资产, 而把应付顾客提取存款建立在吸收别人存款的基础上, 一旦没有存款或更多的存款吸收, 就难以应付顾客提取存款, 形成被动局面。“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 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 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三条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⁴⁹

(五) 货币危机与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认为, 货币危机往往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先导和表现。经济危机开始时, 随着商业票据的兑现, 出现对作为支付手段的现金的激烈追逐。于是, 一方面是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又因银行正窘于应付存款提取而缺乏。而且, 似乎问题也只是在于商业票据能否兑换成货币。然而, 商业票据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而这时来源于现实资本积累的现实买卖的扩大, 已经远远超过社会需要, 这正是整个危机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 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⁴⁰ 所以, 作为危机先兆的货币危机, 并不是危机的原因, 相反, 它是资本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 “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 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⁴¹,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 只要信用突然停止, 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 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所以乍看起来, 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⁴² 马克思极力反对“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领域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方法。”⁴³ 显然, 按照马克思的货币信用理论, 再生产过程失常、经济矛盾激化是金融危机的根源。由此可见, 我们研究金融危机, 必须深入到再生产过程中探本溯源。

马克思还注意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国内金融的影响。他认为, 国际收支状况也是导致货币信用危机的重要原因。他说: “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⁴⁴

(六) 马克思对 1844 年英国银行立法和通货原理的批判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对 19 世纪的英国商业危机, 特别是对 1847 到 1857 年的危机发展过程进行过透彻的分析。1825 年和 1836 年英国爆发商业大危机之后, 当时英国人把李嘉图通货原理作为银行立法基础, 并通过了 1844 年银行法。按照李嘉图的原理, 商品的价格是由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 只要调整纸币的发行量就能保持价格的稳定。在李嘉图

看来, 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 就是这种货币规律遭到破坏。马克思在分析李嘉图信条的时候, 着力分析了影响货币数量的各种因素, 包括制度因素、市场因素、信用因素、技术因素和商人的心理因素。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 交易的需要调节着银行券的流通数量; 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一样, 完全由交易上的需要决定, 银行还有其他创造信用和资本的办法, 虚假的繁荣可以靠信用来维持, 也可能出现与产业周期各阶段完全无关的通货膨胀和收缩。通货的扩张和收缩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的需要。通货学派的误区, 就在于从货币数量本身去找影响价格的原因, 去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马克思指出, 从 1844 年银行立法之后十年全国规模的试验, 到 1857 年的英国经济危机, 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金融手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危机, 但是深层的矛盾决非金融部门所能解决, “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⁴⁵。

综上所述, 马克思是从制度根源的角度探究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的。他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的最后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他把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 认为不消除这种制度, 任何立法都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

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的, 但是这个理论也告诉我们, 探究金融危机的根源, 不应只看现象, 而应该从制度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入手。马克思的理论, 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金融风险 and 危机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 虽然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 但是在经济体制层面也具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同样的、属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性的东西, 也存在种种产生金融风险的因素。因此, 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金融风险, 也应该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吸取丰富的思想, 学习科学的方法。

注释:

10 11 13 14 15 16 17 20 22 25 马克思:《资本论》, 中文版, 第 3 卷, 585、532、278、532、650、454、450、650、670、585、499、585、555、554、55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6 卷, 第 2 册, 584 ~ 585、58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恩格斯:《反杜林论》,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 1 版, 第 3 卷, 315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2 18 19 马克思:《资本论》, 中文版, 第 1 卷, 158 ~ 15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2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文版, 160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武汉 430071)

(责任编辑: 金萍)